

陆庆夫 郭锋 王冀青

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

甘肃教育出版社

K870.6
16

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

陆庆夫 郭 锋 王冀青

甘肃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白玉岱

黄 强

版式设计：陈安庆

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

陆庆夫 郭 锋 王冀青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55,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

ISBN 7-5423-0159-4/K·10 定价：5.50元

前 言

自从敦煌藏经洞发见以后，被称之为当今世界学术新潮流的敦煌学迅速发展起来。这股潮流曾几经波折，历八、九十年而不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汹涌澎湃，波澜壮阔。

这一学术新潮流的兴起，应是各国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此，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早在1930年就已经指出：“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①在这些学人中，有学识渊博的专家、教授，有精力超人的探险家、考古者，他们有的为了寻访宝藏，曾经万里孤征于惊沙大漠；有的为了保存、整理秘籍，甚至不惜变卖家业；有的为了探索科学真理，虽双目失明却仍然孜孜以求……他们或筚路蓝缕，开创于前；或弘扬光大，履踪其后；而更多的后起之秀，则沿着这条由老一辈学者所开拓的道路继往开来，奋力前行。他们在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目和研究诸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在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中西文化交流等学科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各国学人的心血与汗水，写就了一部敦煌学发展史。

学习敦煌学发展的历史，使我们对老一辈敦煌学家有了进一步认识：他们献身科学的精神与事迹感人至深，足以使晚辈受到教育与鼓舞；他们关于敦煌学的许多论著影响深远，至今仍然有重要参考价值；他们对敦煌学所作的卓越贡献举世瞩目，已作为一笔珍贵的遗产造福后学。然而，可惜的是，时至今日，还没有

^①《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见到一本全面评介他们生平事迹的著作问世。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敦煌学发展的历程，了解老一辈敦煌学者开创的业绩，也给敦煌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方便，我们决定较为系统地介绍一批中外著名敦煌学家。通过评介他们的生平，论述他们的著作，探讨他们的研究方法，阐明他们在敦煌学领域的地位与贡献。

学习敦煌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敦煌学作为一门国际性学科，一开始就是在各国老一辈学者的相互支持与合作中进行的。罗振玉等中国学者通过伯希和向国人首次公布了部分敦煌秘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则经常从罗振玉那里获得有关敦煌学方面的信息与资料，在日本开展敦煌学研究，出现了“海内外学者移书论学”^①的现象。正是考虑到敦煌学的国际性，我们在为本书选录敦煌学家的过程中，尽量注意照顾到各个地区和国家。对于到过敦煌、吐鲁番等地的早期外国敦煌学者，我们除了客观评价他们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外，对其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劫盗行径，也都作了述评。吐鲁番与敦煌地理位置相近，所出文献在时间和内容方面大体一致，因此吐鲁番学又和敦煌学一起被学术界连称为“敦煌吐鲁番学”，学者们往往兼取两处资料从事研究，不好断然分开。有鉴于此，本书在内容上兼涉吐鲁番学的研究成果和著名吐鲁番学者的评传。

本书共收入已故敦煌学家评传二十个，其中中国八个，日本五个，欧美各国七个。这在名家辈出的敦煌学领域中仅仅是一个极小的数字，远不能反映敦煌学发展的全貌，应该说这一工作作为一种尝试才刚刚开始。希望能够得到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的支持帮助，以便将来写出增订本或者续编。

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检索之便，我们还编纂了《本书所收中外著名敦煌学家主要论著编年目录》，附于书后。从中可以显示

①罗振玉《海宁王忠愍公传》。见《罗氏集》卷之四。

出各位学者研究的重点及他们之间的异同、先后与联系。

本书由陆庆夫撰写中国部分及附录部分，郭锋撰写日本部分，王冀青撰写欧美部分，由陆庆夫负责全书的组织与统稿工作。

由于我们学力有限，经验不足，仓促成书，在观点的阐发与史实的叙述上难免会有差失，欢迎批评指正。

作 者

1989年8月

目 录

第一卷 中国的敦煌学家

罗振玉	(1)
王国维	(16)
陈垣	(29)
陈寅恪	(39)
向达	(53)
王重民	(66)
贺昌群	(78)
黄文弼	(89)

第二卷 日本的敦煌学家

内藤湖南	(101)
大谷光瑞	(113)
羽田亨	(127)
那波利贞	(142)
仁井田升	(156)

第三卷 欧美各国的敦煌学家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171)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	(193)
保罗·伯希和	(204)
亨利·马伯乐	(224)
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	(233)

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鄂登堡.....(247)

兰登·华尔纳.....(262)

附录:

本书所收中外著名敦煌学家主要

论著编年目录.....(277)

第一卷

中国的敦煌学家

罗 振 玉

(公元1866—1940年)

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罗振玉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人有贡献的人物。他一生治学勤奋，学识渊博，撰著等身。在甲骨学、金石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经学、校勘学、汉晋简牍及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等方面，都做出过突出成就。他不仅是一位金石考古学家，也是一位敦煌学家，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罗振玉，字叔言，一字叔蕴，号贞松、雪堂、仇亭老民，祖籍浙江上虞永丰乡，常自称“永丰乡人”。关于罗氏生平，可分四个时期概述。一是早年求学时期。罗振玉出身于晚清旧官僚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五岁入塾习五经，读唐宋诗词，见地过人。十六岁应童子试，名列县学第七。自幼喜好金石文字之学，征集拓本，搜购器物，考订经史，敏于著述。十七岁即为《金石萃编》一书订正补阙，校碑七百多通，后写成《金石萃编校字记》。十九岁更有《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问世。二十六岁写有《眼学偶得》、《五史校议》、《干禄字书笺证》

等。三十岁以前，已撰各种著作近二十种，其中不少观点新颖，发前人所未发，颇得当时海内宿学鸿儒称许。^①罗氏本人也因此成为学术界的知名人物。

二是宣传“农为邦本”、“中日亲善”及在教育部门任职时期。1894年，清朝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举国震动，各种救国主张蜂起。这时罗振玉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有感于“农为邦本”，立志倡导农学。他研读了大量中文和西方农业书籍，遂于1896年与友人蒋斧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开办“农报馆”，翻译欧美和日本农业书籍，聘请日本学人藤田丰八主持翻译。数年间，共出各类农书百余种，积极向国内介绍了西方农业科技发展情况。戊戌变法开始，罗振玉主张效法日本，倡导“中日亲善”，乃于上海自费创办“东文学社”，请藤田丰八主持教务，又以日本驻上海副领事诸井六郎，书记船津展一郎为教员，讲授日文及科学，王国维即为该社最早的学生之一。由于罗氏在“农学社”和“农报馆”的成就，很受清朝当局注目。湖广总督张之洞曾于1900年电邀罗振玉出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校监督。1901年罗在湖北创办《教育世界》杂志。继而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转任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东文科监督，1903年被聘为两粤教育顾问，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并出任监督。1906年，罗振玉被推荐为清政府学部参事厅行走，后又充任殿试襄校官，学部考试襄校官、学部参事官等。1909年，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曾奉派遣赴日本考察农学。

三是侨居日本致力学术研究时期。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应日本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教授邀请，与王国维携眷东渡日本，在那里一直住了八年（1911—1919年）。这八年是罗

^①详见张舜徽《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收入《王国维学术论文集》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氏潜心学术著述的高潮时期。他终日手不释卷，足不履地，效率之高，每年必成书数种，文若干篇，有时一年成书多达十多种，甚至一月成书两三种（例如1916年3月成《古器物范围录》、《金泥石屑》、《历代符牌后录》三种）^①。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殷墟书契考释》、《流沙坠简考释》以及有关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都是在这时期完成的。

四是追随溥仪投靠日本军阀时期。从日本归国后，罗氏一度曾出资开办工厂，招收无家可归少年，卖字鬻物，积极从事救济灾民工作。1924年，罗振玉奉溥仪诏，入值南书房。不久，冯玉祥派兵将溥仪逐出清宫。罗氏等则保护溥仪微服去到天津。此后，罗氏更利用他同日本人的关系，以清朝遗老的身份，开始同日本军政要人进行勾结，企图依靠日本军阀的力量恢复清室。1932年，罗氏随溥仪赴长春，积极筹建伪满洲国，并充任临时政府督办和伪满洲国监察院长等职，成为民族的罪人。1940年，罗氏以心痛病卒逝于旅顺。^②

通观罗振玉一生，他在事业上是积极进取的，在学术上是勇于开拓、勤奋著述的。但是在政治倾向上，他却顽固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尤其到了晚年，从保守终于走向反动，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二

历史上的污点不能掩盖罗氏一生的业绩，不能勾销他在抢救、保存、刊布古籍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和在敦煌学领域里的开

①参考杨升南《罗振玉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三辑。

②参考赵林《罗振玉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集》。另见《永丰乡人行年录》，江苏人民出版社版。

创之功。

1909年溥仪登极，醇亲王载沣辅政，决定将内阁大库积存的大批文档焚毁。清内阁大库是明文渊阁旧址，中藏大批元明清历代档案和古籍。罗振玉听到消息后，急忙告诉军机大臣张之洞，请他出面加以保护。由于罗振玉从中奔走，终使总数达八、九千麻袋的资料移归学部保存。进入民国后，这批资料移交历史博物馆收藏。1921年，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竟以这批材料无用为由，将其中的四分之三卖给纸商，得银币四千元。次年，罗振玉在北京街头见到《洪承畴呈报吴兆叛案揭贴》和《高丽王进物表》，知为大库之物，亟忙追寻到纸店，见大量档案将被制做还魂纸。为了抢救这些宝贵材料，罗氏不惜借债一万三千元白银，以高于原价三倍的价钱从纸商手中将重达十五万斤的档案买下来，分别藏到北京和天津两地。其中北京的一批辗转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天津的一批则由罗振玉转移到了旅顺。1933年，罗在旅顺成立“库籍整理处”，先后整理刊布《史料丛编》初集十种、二集十二种、《明季史料零拾》、《国朝史料零拾》等多种，终于使几遭噩运的内阁大库资料得以重见天日。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记述基督教传入中国经过的一通具有重要价值的唐碑。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宝贵的考古珍宝”和“世界上四大著名石刻之一”^①。但此碑自明末于陕西周至出土后，一直被搁置于西安郊外的金胜寺，任凭日晒雨淋，无人过问。1907年，一个叫何尔谟的丹麦记者来到这里，企图代一仿制品将此碑盗走。消息传到北京，罗振玉马上向学部报告此事，并致电陕西巡抚，令其妥加保护，此碑始被转入城内碑林，免除了一场劫难。

经罗振玉之手抢救、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除大库文档、唐景

^①《我为景教在中国进行的探险》，转引自《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一书，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教碑外，还有大批敦煌石室秘籍。

自从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西方国家的一些探险家闻风而至，通过各种手段将石室宝藏携裹而去。1908年，法人伯希和继英国斯坦因之后，以购买方式骗走大量最有价值的遗书、画卷。次年8月，伯希和路过北京，将其所获敦煌文书的一小部分展示给在北京的一些学者。其时罗振玉在场，当他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珍品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①又听说在敦煌藏经洞尚存六朝至唐宋写本六千卷，便立即将此事报告学部。由于他的再三说服，终使学部左丞乔树楠同意，并由罗代拟电文命护甘肃都督毛实君马上查封敦煌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1910年秋，这批宝藏几经挫折，终于运到京师学部，以后又被安放到了现在的北京图书馆。这就是北图收藏敦煌遗书的由来。

罗振玉不仅在抢救、保存敦煌古籍方面功不可殁，他在整理刊刻敦煌古籍方面的业绩亦值得大书特书。

就在见到伯希和的当月，罗振玉即在《东方杂志》发表了题为《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见之原始》的文章，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敦煌石室宝藏及其发现的情况。接着在这年秋季，当伯希和展示其从敦煌购买的十多种石室遗书之后，罗氏又约蒋斧、董康、王国维等人将这些卷子编为一集，定名为《敦煌石室遗书》于1909年刊行，在这一时期刊印的敦煌文献还有蒋斧的《沙州文录》、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等，这是我国学者所出版的第一批敦煌文献，其中收入儒家典籍如《尚书顾命》，宗教经义如《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老子化胡经》、《摩尼经》及图经、游记等地志书多种。这些书的问世，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学术界正是通过这些书，才对敦煌石窟遗书开始有了了解。1910年，

^①《鸣沙石室遗书·序》。

日本京都大学派出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学者来华访问考察近两月，拍了不少敦煌写本照片，归国后很快就在日本掀起了一股“敦煌热”。1911年，罗振玉应邀与王国维同赴日本，他们谢绝京都大学的聘职，专心致力学术研究和古文献整理工作。1913年，罗振玉把伯希和三年中所寄的包括古典籍、地志、图经、星占书、阴阳书、古类书等十八种敦煌写本之影照进行整理编辑，分为序言、提要 and 影印写本真迹三部份，题名《鸣沙石室佚书》印行，这是罗振玉寓居日本期间整理出版的第一部敦煌学著作。1914年，罗氏又和王国维分工合作，将法国学者沙畹所寄在敦煌、罗布泊、尼雅一带发掘的汉晋木简影照加以整理分类考释，定名《流沙坠简》出版。这部书是我国学者整理研究汉晋简牍的开山之作，在学术界产生过很大影响，至今仍为西北史地和敦煌学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在这一时期，罗振玉还将他收藏的西域碑刻十五种，其中包括著名的《凉王大且渠安周功德碑》编为《西陲石刻录》印行。后来，当他得知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发掘高昌砖刻多方，即往过录其文，复辑为《西陲石刻后录》印出。1916年，罗振玉又收采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绘画二帧，德国探险家勒考克所获高昌壁画二十帧，编成《高昌壁画菁华》出版。1917年，罗振玉编辑《鸣沙石室佚书续编》，收入《大云无想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各类宗教经书多种。又编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收入群经丛残及群书丛残十九种。1918年，罗氏将其历年整理敦煌遗书所写的有关序、跋编成《校刊群书叙录》二卷，其中有《星占书跋》、《阴阳书跋》、《本草集注序录跋》、《唐写本论语子路篇跋》、《敦煌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跋》、《敦煌本礼记卷三檀弓残卷跋》、《敦煌本毛诗故训传残卷跋》、《唐写本汉书王莽传残卷跋》、《古类书三种跋》等。罗氏校勘图书种类多，审核细，为后人从事敦煌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19年，罗氏从日本归

国后，继续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1924年编《敦煌零拾》，收入长诗《秦妇吟》及俚曲、唱本多种，这是一本汇录较早的关于敦煌文学资料的专辑。1925年，罗氏将流散在国内的一些敦煌藏经洞的残纸碎片加以搜集整理，名曰《敦煌石室碎金》行世。这一年，他还出版了《玺印姓氏征》二卷、《西夏官印集存》以及他的考释文集《松翁近稿》。1928年，罗氏编《古写本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收入敦煌写本多种。迁居旅顺以后，罗于1926年编写了《辽居杂著》，并于1933年完成《辽居杂著乙编》，这两书收入罗氏整理的部分敦煌吐鲁番文献，如《敦煌写本毛诗校记》、《高昌传录》等，还收进了经过罗氏重新修改的增订本《麹氏年表》以及他对高昌时期疆域、城镇、官制等问题的考证。1939年，也即他去世前夕，罗氏仍尽个人所藏，整理出版了《贞松西陲秘籍丛残》三集，其初集收入经注、历书、医方、占卜、户籍、曲子词、佛曲等二十多种；二集收入道教经典七种；三集收入佛经、律书等十余种。此外，罗氏还写出敦煌学研究论文多篇，著名的有《补唐书张议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

总之，罗振玉一生献身学术，勤于编撰，特别在对敦煌吐鲁番秘籍的保存、整理方面，时间之早，贡献之大，本世纪以来，堪称第一人。

三

罗振玉是我国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通过对敦煌遗书资料的整理，结合史籍记载，或考证史事，或校勘典籍，或拾遗补阙，或纠谬正误，范围所及，遍涉经史子集各部，为我国敦煌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唐朝自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吐蕃军队乘虚而入，河西陇右之地相继沦陷，前后达七十多年。唐宣宗大中年间，沙州人张议潮

领导当地人民进攻沙州城，驱逐吐蕃镇将，光复沙州，再克瓜州，后几年，又连下伊、河、甘、鄯、岷、廓、兰等州，唐懿宗咸通年间，收复了凉州和西州，至此，十一州版图重归朝廷，河西百姓得以重睹汉官威仪。张议潮亦因其光复河西之功被封为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归义军节度使及营田处置观察使，受到当地广大百姓歌颂。张议潮的英雄业绩本应彪炳史册，然而两《唐书》却均无传。自敦煌遗书发现后，罗振玉据伯2568号卷子并石刻及史籍中零星记载，于1913年作《南阳张延绶别传跋》，历考张议潮事迹。十四年后又根据新获得的敦煌资料，经过数易其稿，写成了《补唐书张议潮传》。1914年，罗氏复据各种载籍资料和敦煌文书，排比曹议金家族事迹，写成《瓜沙曹氏年表》。曹议金为张议潮之后又一个对河西政局影响重大的人物，曹议金及其子孙经营河西，自五代至宋，长达一百多年。其间，曹氏政权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各族均保持着友好关系，河西境内，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对此，史书记载极少。罗氏征引宏富，考证审慎，遂使曹氏史迹贯通一表中，俾研究者得以一目了然。诚然，由于条件所限，罗氏未能接触到更多被劫海外的敦煌经卷，以上两文难免存在疏漏。对此，后来学者已经有文补正。^①然而，利用敦煌资料研究历史，对张、曹归义军节度使事迹加以重视并为之立传，以补史书记载之缺，罗振玉当为先行者。

对唐朝前期的典章制度，各类史籍记载较详。但是对于唐朝后期的一些制度，史籍往往记载很少或是漏载。故运用敦煌所出唐代文书，考证唐朝后期的某些制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

^①向达《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载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姜亮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见《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1期；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见《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3期。以上诸文均载于兰州大学敦煌研究室编《敦煌学论文选》（1983年印）。

题。罗振玉1913年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卷写的跋文里就指出，有唐一代制度，《表》、《志》所述多依据《六典》、《通典》，唐中叶以降，无制度专书，宪、穆以后之制，大半阙如。如关于唐朝代北水运之置，史书中只在个别传中偶有涉及，而《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卷中，就出现了“代北水运使院”这种机构。据此，罗氏提出运用敦煌资料，结合纪传所记，参以唐人文集所载，来复原唐代某些制度，以补史籍缺载的构想。^①敦煌遗书《水部式》残卷云：“沧、瀛、贝、莫、登、莱、海、泗、魏、德等十州，共水手五千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运，二千人平河，宜二年与替。”又云：“安东都里镇防人粮，令莱州召取当州经渡，得助人谙知风水者，置海师二人，拖（殆即舵字）师四人，隶蓬莱镇，令候风调海晏，并运镇粮”。据此，罗氏对不见于唐志记载的唐代海运史实详加考证。从唐书纪传、《唐会要》、《册府元龟》、《全唐文》，碑刻及杜诗等辑录出海运史实十一条，在唐代海运史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图经是方志发展的初步阶段，唐代从中央到地方曾大量编修图经。敦煌所出各种图经，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些图经皆为当朝人所撰，故比较真实可靠，比之后人所修史书，其史料价值更高。通过这些图经，不仅能拾遗补阙，填补历史空白；还能纠谬正误，订正史籍差失。因此，罗振玉对敦煌石室所出图经评价极高，指出其“有裨史地之学”而视为“人间鸿宝”。^②

《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事止于开元年间。所记内容始于水渠，竟于歌谣，叙述详赡，文字典雅。特别是其中所记水渠、泊泽、地堰为他书所无。七渠之名，仅高居海《使于阗记》提到其中之一的都乡渠。盐池三所，《元和郡县图志》则仅记其一而

^①《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以下引文未注者，皆见此书。

^②《沙州志跋》，原载《敦煌石室遗书》。